

《登泰山记》新解

■ 童志斌 金琳

【摘要】姚鼐《登泰山记》，全文短小精悍，叙事简洁明快，其中的情感意涵含蓄蕴藉。分析姚鼐何时登山、与何人登山、为何要登泰山等问题，以贴近作者内心；深入文本的平凡字句与行文，挖掘文字背后的深意，从而窥见作者微妙的内心世界。

【关键词】《登泰山记》 姚鼐 文本 语言 内心

《登泰山记》文字洗练简明，其中的情感意涵含蓄蕴藉，读者需仔细推敲，“披文入情”，方能读出情味，进入作者内心世界。

否则，就像有论者称本文只是“记述了作者携友人冬日登泰山观日出的经过，生动地表现了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色和日出时的雄浑景象”^[1]而已，难见此文的特殊况味。或含糊地指出本文“充分展示了雪后登山的别样情趣”^[2]，至于是何“情趣”难以了解；或以“《登泰山记》把泰山的美、古老文化的美呈现给读者，二百年后读此文，仍可感受到作者那颗热爱祖国、热爱名山大川的心是与读者相通的”^[3]这类话语对文本意涵做简单概括，难以让人信服，也是不足为训的。

刘俐俐在借鉴了罗兰·巴尔特关于“作品”与“文本”的观点后，提出了以下主张：

文学作品(work)可以被视为文学家创造活动的最终成果，意指源自特定的作者，具有文学属性并蕴涵特定意义的**语言构造**。文学中的文本概念，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的具体**语言形态**本身。……如果探寻艺术价值，只能在**文本**中进行。^[4]

对于文本“语言构造”的充分关注与打开，是解读文本的首要意识与关键之所在，在《登泰山记》的解读过程中体现得相当充分。

一、文本三问，体贴入微

1. 辞旧迎新——为何“此时”登泰山？

姚鼐登泰山的时间为“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”，此时正值冬季，天寒地冻，百草凋零，为何偏偏挑选这一时节？个中滋味，值得细品。

具体展开，文中写道“是月丁未，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”及“戊申晦，五鼓，与子颖坐日观亭，待日出”。“是月丁未”为该月月末的丁未日，即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。古时“晦”指一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所以“戊申晦”，即戊申日是月底这一天。丁未的后一位便是戊申，由于支纪日法也可得出“戊申”就是十二月二十九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乾隆三十九年即1774年的腊月是没有三十这一日的，因此登上日观亭看日出的“戊申晦”这天，正好是除夕。——让人颇感讶异的是，统编教材编者对上述“是月丁未”“戊申晦”虽做了详细解释，却不知为何，有意不点破(?)姚氏登临泰山所选时间的至为特殊之处：作者是在农历大年廿八启程登山，并在除夕节这一天早晨“观日出”。姚鼐“选择”了这样一个特殊时节来登山观日出，其意义显而易见。除夕，乃一年之中岁序更替、辞旧迎新的日子。为了要在这特殊的日子看到特殊的日出，所有的远道而来、冒着风雪便也都不难理解了，极端恶劣的

天气反而更能衬托出姚鼐登泰山的坚决和游兴之高。

2. 风雨故人——为何偕“此人”登泰山？

除了明确“何时登泰山”，我们同样应当关注“与何人登泰山”。“知府朱孝纯子颖”，何许人也？

朱孝纯，号思堂，又号海愚，是当时泰安的知府。姚鼐在文中郑重交代，这日正是与朱子颖坐日观亭，而非旁人。此行一有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，二逢送旧迎新的特殊时节，朱子颖能够前来赴约，可见他与作者关系非同一般。

姚、朱二人的共同业师刘大櫟之《朱子颖诗序》中曾如此记载：“子颖奇男子也……后数年，子颖偶以七言诗一轴示余，余置之座侧。友人姚君姬传过余邸舍，一见而心折，以为己莫能为也，遂往造其庐而定交焉。姬传以文章名一世，而其爱慕子颖者如此。”^[5]

年轻的候考举子姚鼐（22岁）在京城初识朱子颖，便“一见而心折”，并立即前往拜访结交。作为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，论诗艺自然远胜朱子颖，他却对子颖推崇到如此地步。姚鼐在朱孝纯身后为其《海愚诗钞》撰序，其中深情回忆二人之友谊：“鼐年二十二，接子颖于京师，即知其为天下绝特之雄才。自是相知数十年，数有离合。子颖仕至淮南运使，延余主扬州书院，三年而余归，子颖亦称病解官去，遂不复见。”^[6]

刘大櫟也曾追述姚、朱二人登泰山之往事：“乙未之春，姬传以壮年自刑部告归田里，道过泰安，与子颖同上泰山，登日观，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，其幽怀远韵与子颖略相近云。”^[7]可见二人心心相印、志趣相投，因而才能在岁末共同完成风雪中登高观日出的豪迈之举。假设仅以教材注释中的“当时是泰安府的知府”^[8]目之，很大可能又与文本的深层意味失之交臂。

3. 消其沉忧——为何要“登泰山”？

姚鼐为什么选择除夕这个时间登泰山？为什么和朱子颖一同登泰山？解答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同样要追溯当时姚鼐的生活境况。

据“姚鼐年谱”记载，乾隆三十九年秋天他“乞病解官”，又于“冬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至山东泰安”“与子颖登泰山日观观日出”^[9]。可以发现，姚鼐登泰山的这一年，正是他辞去刑部官职、回归故里的一年。

自1751年礼部会试名落孙山后，姚鼐一共应试六次，历经十余年。屡试不第，仍屡败屡战，必是考取功名后出人头地、光宗耀祖的信念支撑着他。可为何在其壮年得意、升迁有望之际，主动辞官？背后的复杂可以想象。在后来的《赠程鱼门序》中姚鼐这样夫子自道：

夫士处世难矣！群所退而独进，其进，罪也；群所进而独退，其退，亦罪也。^[10]

可见他做辞官之计也并非决绝容易。他在与《登泰山记》几乎写于同一个时间的《晴雪楼记》中写道：

余駑怯无状，又方以疾退，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。与子颖仰瞻巨岳，指古明堂之墟，秦汉以来登封之遗迹，东望汶源西流，放乎河济之间，苍莽之野，南对徂徕、新甫，思有隐君子处其中者之或来出。慨然者久之，又相视而笑。余之来也，大风雪数日，崖谷皆满。霁日照临，光晖腾映，是楼之名，若独为余今日道也。然则楼之记，非余而孰宜为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，作楼始成。三十九年十二月，桐城姚鼐记。^[11]

对照《晴雪楼记》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。“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”，可见姚鼐本是怀着深沉的忧思前往泰安的。当与子颖在除夕共同领略了“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”“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采”的人间胜景时，他

仿佛也从充满忧思的现实中抽离出来,达到了“宠辱偕忘”之超然境界。此行是姚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从此他开始专心治学,并最终在古文创作与理论上树立其历史地位。

“姚鼐年谱”载:“四十年乙未先生年四十五岁春正月自泰安还京旋即南归。”^[12]姚鼐于秋天辞官,历经数月迟迟未归乡,即便年三十也不跟家人团圆,登完泰山后“旋即南归”。“旋即”二字,表现了姚鼐从泰山回来后内心之释然,也昭示了此次泰山之行于其生命意义之大。

二、披文入情,虽幽必显

《登泰山记》全文不到五百字,直接描写登泰山过程和描绘泰山景物的只是寥寥数笔。清代王先谦曾评:“具此神力,方许作大文。世多有登岳辄作游记自诧者,读此当为搁笔。”^[13]他认为其笔力非凡、令人叹为观止。那么,《登泰山记》究竟好在哪里?平凡的文字背后究竟有何深意与魅力?——我们还是要由文本语辞入手,于平凡处做探究,由文本辞章考究处(炼字炼句处、章法考究处)向文本深处“漫溯”,方可有得。

1. 为何要详述京师至泰安的过程?

本文题为《登泰山记》,当然是以写“泰山”与“登泰山”为重点。可为何记述登泰山的过程不是从泰山脚下,而是从京师出发开始写?对京师到泰安过程的描述,是何用意?

“自京师乘风雪,历齐河、长清,穿泰山西北谷,越长城之限,至于泰安”一句,用“乘”“历”“穿”“越”“至”等一连串的动词,表现旅途之遥远和艰难,也暗示作者“努力”向泰山走来之内心:再远再艰辛,也要前往。从这段描写及上文关于背景的剖析中,我们可以窥见姚鼐当时意欲与子颍会合、与泰山会合的迫切与期待之情。

2. 为何要交代东谷?

文中写道:“古时登山,循东谷入,道有天门。东谷者,古谓之天门溪水,余所不至也。”如写登泰山,只安心写自己所走的路径便是,为何要郑重交代自己没有去的地方呢?为了保持叙事的完整性?细究起来,恐怕并非如此。如前所述,乾隆三十九年是姚鼐人生的重要节点。当时他面临着是否要辞官的“抉择”,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:前方有路,究竟往哪条道走呢?

泰山之“取径”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重要的“取舍”。此时可供选择的几条路,该走哪条呢?古人走的路?还是常人走的路?姚鼐都没有走,他选择了自己的这条路,“余始循以入,道少半,越中岭,复循西谷,遂至其巅”,并最终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日观峰。

交代“泰山正南面有三谷”以及东谷这条“余所不至”之路,实则别有深意。三条路,既是姚鼐登山时面临的抉择,也象征着他当下面临的人生抉择。

3. 为何要写末尾两段?

行文至“绛皓驳色,而皆若偻”,对登泰山的直接叙述或景物描写似乎都已写完了,为何姚鼐不直接结文,还在最后加“亭西有岱祠”与“山多石,少土”两段文字呢?

我们试着来品析一下。与写山石的一段对照可知,“亭西有岱祠”一段描写的全部是人文景观,后一段全部是自然景观。

(1)亭西有岱祠,又有碧霞元君祠。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。(2)是日观道中石刻,自唐显庆以来;其远古刻尽漫失。(3)僻不当道者,皆不及往。

本段包括三个句子。从语句构造角度看,第(1)句是动词“有”“在”构成的典型的“存现句”,呈现的是客观事实:山上有“岱祠”“碧霞元君祠”“皇帝行宫”这些名堂。作者只是交代山上“有”这些东西,那么有没有对它们加

以特别的关注呢？文本显然未着一字。但第（2）（3）句就不同了，“观”“往”两字清楚地表明山上不但“有”“道路石刻”存在，且姚鼐当日确实特地前去观摩了。而那些僻不当道的石刻，他“不及往”，透露出他内心的遗憾。

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是泰山成为“岱宗”之首要因素。数代帝王曾亲登泰山封禅祭祀，乾隆皇帝更是6次登上峰顶，留有众多诗篇和御笔碑碣。与“孔子登临处”相类，当今圣上登临处与御笔碑碣处，肯定也令时人趋之若鹜。可姚鼐却只在行文中以“有”“又有”轻轻带过，与“观道中石刻”形成明显反差。

朱子颖曾于登泰山后（新春正月初一）作《登日观图》，姚鼐在图上题诗云：“前生定结名山诺，到死羞为封禅文。”这两句诗，概括了姚鼐辞官从文的人生志向，也清楚回答了前面的问题。与挚友相约“名山”，观日出是感自然之气韵，观石刻是品古人之遗风；而帝王将相的行宫、万众景仰之庙祠圣地，则恰好是姚氏着意要疏离之所在。

“山多石，少土”一段，写的则全是自然景观。

山多石，少土。石苍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圆。少杂树，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顶。冰雪，无瀑水，无鸟兽音迹。至日观数里内无树，而雪与人膝齐。

此段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句式特殊，多用短句，几乎不着虚词，简洁明快；二是所描写的景物清寒冷峻，无瀑水，无树，无鸟兽音迹，剩下泰山自身成为一个与世无涉、远离尘嚣的自在主体。王国维说：“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。”^[14]此处对泰山之巅的景观描绘，带有明显的姚鼐“我之色彩”。与挚友“道中迷雾冰滑，磴几不可登”，在“大风扬积雪击面”中领略了日观峰的极顶胜景，其内心关于辞官得失之迷雾已然消散净尽，对于官场沉浮的“沉忧”也彻底抛却。行文至末尾，其情感逐渐归

于平静，因此行文语气上趋于缓和，对景物的描写也显得淡然。这是行文的水到渠成，也是姚鼐内心宁静、心无挂碍之自然外化。

综上所述，对于古文经典之作，尤其是像姚鼐这样对文章写作怀着相当强烈的自觉意识，对文本“辞章”刻意关注、惨淡经营的作家作品，我们必须真正沉潜于文本的“语辞世界”，才能从语言揣摩品味中把握作者的心灵脉搏，同时获得文本阅读的审美愉悦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[3] 温儒敏，总主编，教师教学用书语文 必修：上册 [M]. 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2019：233，270.

[2][8] 温儒敏，总主编. 语文：必修上册 [M]. 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2019：122，120.

[4] 刘俐俐. 导读 文学经典：一个开放性的研究课题 [M] // 刘俐俐. 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. 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：导读4.

[5][7] 刘大櫟. 刘大櫟集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：63，64.

[6][10][11] 姚鼐. 惜抱轩诗文集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6：41，97，190.

[9][12] 郑福照，编. 姚惜抱先生年谱 [M] // 北京图书馆，编.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107册. 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9：581，585.

[13] 王先谦. 王氏续古文辞类纂：下 [M]. 上海：世界书局，1937：666.

[14] 王国维. 人间词话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：5.

(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21004；
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321004
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21004)